找回國家凝聚力和文化自信

一

文化自信是最近幾年中國領導人和官方媒體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個概念。但是究竟什麼是我們需要自信的文化？亦或說我們需要拒絕什麼文化，保留什麼文化？這樣一個核心的問題沒有官方的解答。對應下級政府和廣大國民，表現出的就是新古跡興起而真古跡消失、假國學猖獗而真國學式微等等。對於這等亂象，卻無一個權威的聲音撥亂反正，卻無一個文化傳統的真理大討論。

想要解構的、支離破碎的傳統文化的全貌，必然要到故紙堆里去翻找。而這樣的一些工作，在“新文化運動”之後，卻藉由新舊文化的對立衝突而得以完善。自認為有責任傳承傳統文化道統的舊式文人利用新時代更為廣泛的陣地與批駁傳統文化的新式文人進行了大範圍的論戰。這從支持與反對兩方面以前所未有的詳細程度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闡述。

與此同時，中國又面臨著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侵略。這一系列的侵略，在中國抗日戰爭中達到高潮。敵人的強大與自己的弱小催生了一大批對國家、民族的未來感到絕望的投降派，這一部分投降派又通過種種渠道在全國散佈一種“中必輸”的氣氛。

竇四先生有感于這種長久以來的投降主義的言論，將自己在北大“中國通史”一課的講義整理出版，是為這本國史大綱。用講述歷史

的方式宣揚優秀的傳統文化，由此鼓勵大學中的青年熱愛以及保衛自己的祖國和民族。是謂“文化自信”。

二

寶四先生認為中國自古以來在戰略上就重於中央之凝合而非四周之吞併，是以有俗語“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句俗語所折射的觀念就是中國終極政治理想的一種體現。從儒家發源開始，就秉持著“天下”和“道”的觀念，認為要建立一個統一的、由天子領導的國家。更重要的是，天子必須出自諸夏而非蠻夷，而諸夏就是擁有天命的民族。雖然從事實上存在外族入主中原取代了原有的漢族政權，但是不能夠與原來漢族合一的政權往往缺乏正統性，一如北朝的長期分裂與混亂和元的崩潰。[這些入侵的外族最初被視為蠻夷，但是出於統治的需要，他們不得不任用漢族的官僚。而這些官僚的存在使得統治階級不得不漢化，最終成為了事實上的漢人。]“胡漢混血”豐富了中國的文化，也給遲緩的中國政治和學術注入了新的血液。

另外一方面，沒有與漢融合的少數民族政權，也同樣能夠在不接受血統融合的情況下獲得天命。這就是儒家的“道”，也可以說是統治的合法性。如果一個異族入侵建立的王朝能夠按照儒家的政治思想，實行“仁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那麼這樣的王朝也就成為了正統，就獲得了天命。

而對於入侵的帝國主義而言，中國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都是他們殖民的障礙。尤其是立志要吞併中國東北的日本，更是以“脫亞入歐”為目的，摒棄了自己的傳統文化，甚至想要將這種文化

上的完全變革加諸中國。日本人稱東北為滿洲，雖然最早見諸學術著作，但在此之後藉由“滿人治滿”的幌子支持遜帝溥儀建立偽“滿洲國”，實為吞併中國之一小步。這恰恰反映了看似與政治無關的學術研究的政治性。而中國在彼時卻是一個保守的社會，對待激烈的變革並不感冒。

對於這種以全方位奴役為目的的侵略，不符合中國傳統的天命學說，甚至要徹底廢除這種天命學說的土壤。雖然在國家的某些地區客觀上存在民眾支持侵略者的行為，但在中國總體來看，日本的侵略大大損害了民眾的利益，失去了絕大多數的民心。花園口決堤之後，河水氾濫，千里白地。國民政府這一草率之行為，固然阻止了日軍繼續進犯，但是失去了黃泛區之民心。日軍趁虛而入，利用其它地方征集來的軍糧收買人心，以至於之後國軍收復時當地百姓反而幫助日軍，此為天命學說在某一局部之具體表現。即使在此之前國內部的混亂持續了多年，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可以獲得天命，但是侵略者的行為確保了他們永遠得不到天命。

既然日本不可能成為“夏”之一員，自然只能屬於蠻夷。對於蠻夷，本應是“修文德以來之”。但是蠻夷並沒有和你講這一通道理，而是強迫你放棄自己的信仰、思想。那麼就只有以命相博了。

不幸的是，在此之前有一個“新文化運動”，大大貶低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民眾心中的地位。很有趣的是，領導“新文化運動”的諸君，除胡適留學美國以外，其餘陳獨秀、魯迅、錢玄同、蔡元培等，均有留學日本或是學習日語意欲留學日本的經歷。寶四先生因而試圖展示中國歷史上的光輝形象，藉以喚醒民眾對本國歷史、文化的熱愛，由此催生出更為強烈的愛國情感。

三

國史大綱作為一部歷史教科書，對於一些史料的引用就沒有象西式的科學論文那麼嚴謹和格式化，因此我在閱讀時是存疑的。例如上冊二一四、三一三頁所列秦漢、三國之人口數據，確至一戶一口，以至於能夠動員數量龐大的軍隊和後勤力量支持對外作戰，實難想象當

時官僚政府結構之完善，足以調查如此之確切，亦無列出相應參考資料，或為先生臆想？

除此之外，書中地圖均為先生手繪，不免有多處錯誤。一如幾次海侵前後海岸線位置與走勢，與今日地理界定論略有不同。又因先生手繪，城市雖大體方位不錯，倘若細究，恐怕並不準確。

囿於時代限制，當時並無詳細的夏商周田野考古資料。已知的殷墟遺址也因戰火與動亂無法得到完備的發掘和研究。現在已知的種種歷史新發現，當時均無從知曉。

然而倘若細究這些細枝末節，則多數歷史著作一無是處，更能難有新的歷史發現。胡適之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雖然此語問題頗多，但對於鼓勵學術研究、提出新觀點大有裨益。先生在序言中也明說，長於考據的“科學派”往往割裂史實，囿於小小一點，難見全牛，于傳統文化再發現無益。

至於先生成此書，旨在培養歷史研究人才，喚醒這些人才預備歷史學家對本國歷史與本國文化的熱愛。不幸橫遭國難，此書又有了更大範圍的意義。雖如此，先生仍然希望能夠培養超脫于“記誦”（傳統的史學者，以考訂舊有的史料、典籍來進行研究。）、“科學”（以考據史料，著眼小處研究歷史。）、“革新”（以自己的價值觀選取史料，著書立說，從而宣揚自己的價值觀。）三派史學研究方式的新人才。他在相對可靠的史料之上，建立更為廣大的體系，抒發對民族歷史文化的熱愛。

四

所謂歷史研究，找出歷史發展的規律，就是在變革中尋找不變的

“本我”。這種辯證法的概念實際上深深植根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一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乃至儒家崇尚的“中庸”。這種辯證發展的觀點用之於歷史研究，所知的便是某一事物之於中國歷史的真正意義，對中國歷史產生之實質影響。此為實四先生此書所想撥亂反正的一點。“新文化運動”以後，對於傳統文化，社會各界主要持反對態度，並且認為凡是傳統的必然是壞的，對應于外來的西方科學文化乃至共和政體必然是好的。這樣一種非黑即白的極端二元對立的態度對歷史研究固然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例如“革新派”的史學家由此支持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革命。但是另一方面卻是大眾對民族文化的失望與國家凝聚力的喪失。

先生以詳盡的史料，充分的對比，展示了南北朝時期的黑暗動亂。他痛心地指出，這種動亂對學術研究、人民生活帶來了相當的困苦。但是同時，他又指出北方異族入侵促使漢人統治階級發生變革，對隋唐大一統乃至盛唐出現的種種積極作用。並且試圖從政治、學術、經濟特別是民生各種角度展示中國當時的變化。乃至於唐，他亦指出種種看似美好的政治制度之後的不足。特別是對於隋煬帝的評價，先生沒有只是抓住其種種政策方針造成的結果，而是對其初衷、方式、後世長遠角度進行評述。這種更為客觀的評述，已經超脫了原有儒家的視界，沒有局限于民眾是否安居樂業、政治是否清明等等評判標準，而是加入了新時代的“國富民強”的評判標準，亦可見先生治史的新觀點。

雖然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術都在變化發展，但是綿延兩千多年，

中學教科書中對於隋煬帝的評價集中在“驕奢淫逸”四字之上，卻沒有提到“驕奢淫逸”的物質基礎，更沒有說開大運河、北征高麗的最初目的。雖然種種事實皆可推出“驕奢淫逸”，卻忽略了“興國強邦”的另一方面。

仍有一些核心的內容沒有發生變化。在政治上，自秦漢以來，就是有君主、貴族、官僚治理國家。經濟一直以農業為主。學術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到了近代，中國的急劇落後並非中國的種種制度缺少變化，而是變化太慢。從漢的經學形成，到南北朝儒釋道融合，中間有幾百年；從儒釋道的融合之後再發展出程朱理學，又是幾百年；程朱理學之後再到陸王心學，又是幾百年。學術上的變革相當緩慢，但較之政治已是相當快了。漢開始的九品中正制，直到唐宋才被科舉完全取代。而秦以來的丞相制度，雖歷朝歷代皆有削弱，但直到明才真正廢除宰相一職。而經濟上，由於一直以來“重農抑商”的政策，手工業的發展都十分有限，而商業就更不可能出現東印度公司這樣的富可敵國的商業機構。中國的變化如此緩慢，也難怪近代渴求富強民主、“速變”“全變”的革命者等不及。

五

捍衛本民族璀璨之歷史文化，先生認為是每一個有智識的國民的責任，至少需要對本民族既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更重要的是，這是本民族向前走繼續發展的前提。反觀當時與現在的某些知識分子，雖然不能否認他們在學術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或是生活中高尚的人品，但是他們對於自己的國家和民族、對於養育自己的土地，沒有一種溫情與敬意；相反，他們反對乃至憎恨，甚至甘願做敵國的“帶路黨”。他們提出的很多主張，放在中國的現實並不適用。只不過他們主子的制度和文化，他們熟悉得勝過自己本國的現實，倘若神器更易，他們

能分得更大一杯羹。而那些外來的制度在中國的現實中並不適用，最大的原因是他們並不能獲得中國的天命，即統治的合法性。這種驟然的社會變革，一如蒙元的“退耕于牧”，最終會因為人民的反抗而無法推行。

對本民族既往歷史之溫情，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場上看歷史。正所謂“友好歸友好，歷史歸歷史”，歷史和教訓是不能遺忘的，在此基礎上才能握手言和。而一味的迎合既是不尊重歷史，也是出賣本國的利益。移民國外脫離自己的本籍的不足談，尤為可恨的是那些人在國內，卻認為自己應該是外國人，所謂“精神外國人”。這些人在種種場合侮辱本國歷史，標榜自己的“精外”身份，對於一些帝國主義侵略本國行徑非但沒有反思，而是大肆鼓吹，恨不得自己的“精神本國”當時能成功。這樣的人，一言蔽之：民族敗類。

《國史大綱》出版的時期，正是抗戰最為艱難、日寇最為猖狂的時期。投降主義瀰漫社會上下，“帶路黨”、“精日”的活動也幾乎公開。本書的出版，一方面為當時困頓的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教材，另一方面沉重打擊了投降主義的囂張氣焰，為提高國家凝聚力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中國的另一邊，是振奮人心的《論持久戰》。誠然此書中的資料有種種缺陷，作者對於某些事物的態度並非完全客觀，如滿清、共產主義革命等。但是不可否認，當時此書真正教會了民眾“文化自信”：我們並非沒有璀璨的歷史和文化，我們需要的是保衛她。

除了“文化自信”，《國史大綱》還旨在從超脫個人的觀點上去看待

歷史。作者試圖讓讀者從“天下”的角度去看事物的運動和發展，而不是計較個人的得失。這是一種社會責任感，一種“家國情懷”。正所謂：“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也是中國的“士”有別于西式知識分子的地方。士大夫試圖用自己的價值觀去感化他人而不是強迫他人接受自己的價值觀。作者正是用這一種傳統文人的態度去寫這本教科書的。

六

雖然先生並沒有看到當代中國的變革與發展，但是現在所倡導的“文化自信”卻有先生的影子。雖然先生在全書末尾鼓勵大學生做的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並對激進的共產主義革命持懷疑態度，但是他所期望的國民黨員並沒有能夠改變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的事實，相反，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站了起來。而更有趣的是，當時大多數的共產黨員反而成為了先生希望的人，大多數的國民黨員成為先生不想看到的人。但是畢竟這是一本國民政府時期的大學教科書，勢必要支持當時的政府，特別是要讓人民團結在這一代表國家的政府周圍。

這也恰恰反映出寶四先生這樣的相對老式的文人對新生的共產主義的不了解。他們不能明白為什麼一個來自西歐的思想可以與中國實際結合得像中國本土的思想一樣。他們也不能明白為什麼這樣一個自下而上的徹底的社會、政治革命能夠在中國這一保守的土地上成功。

這可能就是他們的歷史局限性吧。